



青年写作:从密室走向旷野

□徐 刚

◆当前青年写作者的最大症结在于,那个顽固封闭的自我,早已构筑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信息茧房,将他们层层包裹在幽深晦暗的密室之中

◆走出密室,迈向广阔的旷野,正是青年写作的不二法门。从文学的“密室”中勇敢地走出来,去感受和倾听来自旷野的风声,进而获得重新发现世界的契机,这是青年写作的一次自我革命

对于今天的青年写作者来说,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显然蛊惑了太多人。在一些青年作家那里,“重复而单调的‘我’”,过着“越来越远的‘生活’”,却幻想“急于求成的‘认可’”,这便容易导致无法实现“创新之‘困’的突破”。(见中国作协创研部署名文章《当前青年文学创作面临的几个问题》)事实上,翻开他们的作品,存在的问题或许远不止于此。长期以来,面对不断崛起的青年作者,我们从鼓励后进的角度,说了太多言不由衷的话,以至于我们自己也将繁荣与热闹视作理所当然,但从作家成长规律和创作良性发展的角度看,其实还有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

青年写作的三个症候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可以随手列出几个当前部分青年作家在写作中存在的现象与问题。其一,“哭天喊地叫苦”。初涉世事的一些青年写作者,往往会以强烈的代入感,投射个体的诸多不易,以此表达初次面对象征秩序时的错愕、不适乃至愤怒。他们走出象牙塔方知世道艰难,却错把个体的暂时遭遇当作世界的恒常与全部。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急切表达关于工作的不爽、生活的不顺和内心的不安,反复吟唱、抒发乃至嘶吼出大体相似的“失败者之歌”,甚至哭天喊地,涕泪滂沱。孤独、困窘、落魄,是他们创作的“主色调”,“班奴”“孩奴”“房奴”是他们关心的“大话题”。在他们这里,日常生活之荒谬、世界图景之暗淡、个体情感之绝望,总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状况之下,他们便难以呈现对他人的体恤和共情、对世界的宽容与理解,更难

以捕捉生活中的光亮与希望。换言之,一些青年写作者正在用他们的晦暗与悲苦,淹没青年理应具有的蓬勃朝气。其二,“戴着假面说不”。在今天一些青年写作者那里,叙事的俗套或许在于,他们往往会虚置一个超凡脱俗的“逃离”姿态,以“不负责任的自我”,塑造所谓“勇敢做自己”的个性神话,以此抵抗那个想象中的“异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赋予“逃离”某种形式的神性,将慵懒、颓丧与无所事事,视为社会重压下青年反抗的某种行动方式,并将其作为“小资”青年自我拯救的重要途径。从一种日渐程式化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固然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身心砥砺,在个体那里,莫名的焦虑,以及更多的负面情绪,终究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但“逃离”只是人生的“例外状态”,不过是短暂的“休止符”。他们处心积虑,从边缘的雄奇中积蓄力量,为的是归返之后的重整旗鼓,“逃离”绝非日常生活的长久之计。问题还在于,这种“逃离”并非十分有效。他们幻想超脱,却又不敢投身酷烈的“大拒绝”,只能“戴着假面说不”,在自我灵魂内部徒劳地自我搏斗。

其三,“装成大人要酷”。青年写作者总是羞于暴露稚嫩,唯恐被人看轻,为此,他们惯于“强装”超出年龄的成熟与深沉。他们总会展开对于琐碎而平庸的“物”的弃绝,积极建构一种貌似高贵的精神生活,体现所谓“灵魂的深度”。这本无可厚非,“伟大的心灵”本来就是个人写作的极致展现。在这个独特的维度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以来的孤独自我,独自面对世界时灵魂的紧张与焦灼。相对于无边的旷野,这大概可以算作密室中的写作,照见的是“洞穴艺术家”自我的幽深状态,以及那难以名状的所谓“孤绝的神性”。

这种灵魂深度的可贵探寻及其背后与想象的自我的殊死搏斗固然重要,但过于刻意的强调,甚至跳开公共生活,于日常性的极致之中直接捕捉某种抽象的精神性,却也容易让写作演变为“头足倒立”的“行为艺术”。毕竟,在今天的文学现场,我们看过太多这类无病呻吟的“把戏”。那些孤独、绝望、颓丧、虚无情绪的简单堆积,似乎已成为这个时代一些青年写作者的耸人听闻的“精神真实”。

不能陷入幽深晦暗的密室

由此不难看出,当前青年写作者的最大症结其实在于,那个顽固封闭的自我,早已构筑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信息茧房,将他们层层包裹在幽深晦暗的密室之中。提到青年写作的“密室”问题,不由得让人想起如今极为火爆的“素人写作”现象。今天,一个极为有趣,也极具症候性的文学状况适时出现了:一方面是王计兵、胡安焉等之前不大有显著创作经验的“素人写作”的如火如荼;而另一方面却是“纯文学”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在纷纷“爆雷”。这就有点像今天的中国足球,一方面是业余的“苏超”火得一塌糊涂,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国足”却烂得一塌糊涂。当然不能说“苏超”的水平就超过了“国足”,但舆论的“风评”是无法控制的。这里值得分析的,恰是背后所体现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尤其注重对于经典作家作品的“致敬”与研习,大多着力于字句和修辞,强调虚构的文学想象力与形式技术的执着探索,而并不注重展开对于独特而新鲜的生活经验的捕捉、积累和呈现。这就使得这类文学作品

表现出一种相似的重复感,进而沦为圈子文学的自我消化和繁殖。究其原因,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向内转”须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事实上,早在2001年那次关于“纯文学”的反思性讨论中,李陀先生就认为先锋文学对当时已然日趋明显的文学失去读者之势负有责任。现在看来,先锋所倡导的“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固有力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形式变革,但在客观上造成了此后文学日益走向所谓“纯文学”的“羊肠小道”。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个不容忽略的文学恶果:一些青年写作者仿佛觉得,坐在家里读一读外国小说,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作家。他们似乎早已忘记,写小说,其实“功夫在诗外”,文学创作的基础永远是广阔的现实生活。大概也是从先锋文学开始,一代文学青年便倾向于在密室中写作,仿佛世界上真有一本武功秘籍,那就是外国小说,只要认真修炼这部秘籍,就能练成绝世神功。为此,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密室里虔诚修炼,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所以他们往往注重研习文学技巧,强调模仿和想象,而不大注意用心关注真正的现实经验。

时至今日,当年的先锋作家早已纷纷进入大学,开始收徒授课,培养了一大批创意写作研究生。这群师出名门的科班人士,恰好与我们前文言及的“素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今天的问题或许就出现在这里。这群“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与他们的师辈一样,在创作早期并不是那么重视现实经验的获取和积累,对于深入生活更是重视不够,反而唯经典作家马首是瞻,对文学的形式腔调和语言修辞孜孜以求。而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文学的评价也变得极为“抽象”。一时间,“名角”收徒,“大佬”背书,年纪轻轻就暴得大

名……凡此种种,皆造成很多青年写作者无法静下心来扎根生活,打磨作品。

迈向广阔旷野,重新发现世界

今天这个场合,当然不是为了列数“罪状”,清算“旧账”,而是要诊断病情,提出药方。面对一些青年写作牢不可破的“密室”,是时候做个了断了。是的,走出密室,迈向广阔的旷野,正是青年写作的不二法门。初登舞台的写作者总会急于展示自我,他们借助经验的再现与编织,获得一种朴素便捷且自然真切的文学表达,由此得以确证个体写作的独特价值。在此之中,童年、梦境与孤独中的玄想,被顺理成章地视作写作的“三大法宝”。而随着写作的成长,他们也企盼着经由自我出发,推己及人,去发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这是因为,自我的抒情或“表演”总是相对容易,而成熟的写作者决然不会满足于独自咀嚼一己之悲欢,他必将放眼整个世界。

正如谢有顺在《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一文中所说,文学写作要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借由“饱和经验法”来让写作重获生机和活力。他将以“素人写作”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的出现,解读为一种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一次从“怎么写”到“写什么”以及“谁在写”的变革。这对我们今天的青年写作同样极富增益。从文学的“密室”中勇敢地走出来,去感受和倾听来自旷野的风声,进而获得重新发现世界的契机,这是青年写作的一次自我革命。就像海子那句诗里所说的,“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声 音

键盘轻叩,段落流淌,一篇结构严谨、文辞优美的文章在AI的“笔下”迅速生成。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迭代升级的创意写作智能体“灵吟灵吟”发布,同步发布了由其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是个典型的AI写作系统,只要输入指令,就可创下前所未有的写作速度。作为文科从业者,我们清晰感知到:写作这一古老的劳作方式,正在经历颠覆性变革。人工智能以惊人效率重塑写作版图,它化身永不疲倦的写手,能瞬间梳理庞杂资料、化解表达障碍、跨越语言藩篱。在信息洪流时代,这看似为人类解放了双手,让心智得以向更高处攀登。不止“灵吟灵吟”,随着AI大语言模型广泛渗透各领域,AI写作已以辅助工具进化为思维的共生体,这场技术革命正悄然重塑人类的认知方式。使用AI写作工具的创作者,创作速度显著提升,算法通过分析亿万级文本库,将人类碎片化的灵感编织成逻辑严密的叙事网络。然而,这份便捷背后,潜藏着认知的暗礁。

AI很聪明,但有时候,它也会出现基础性的错误。有一次,我上传了一张图片,照片中的人有六根手指。我向AI提问这个人有几根手指时,它答“五根手指”;我提示其仔细观察图片后重新作答,回复依旧是“五根手指”;再次提醒,答案仍未改变。直到我直接告知“这是六根手指”,它才纠正“可能是自己错了”。可当我转而说“这是五根手指”,它又回应“疏忽是难免的,人类偶尔也犯错”。过了一段时间,我上传了一张新图,这回不画人了,只画了六根手指的大图,这回才答对了。

这个只是一个偶然的例子,实际上,AI还有其他的幻觉。这种算法性失明,让人陷入深思。我们对AI缪斯的信赖和信心,源于其超人般的知识储备和算法逻辑。人类的意识和思想乃至行动,正对其产生依赖。换言之,AI缪斯正在反过来塑造人类的认知。六指问题是我们能够判断的,可对超出我们认知范畴的问题,AI的输出可能误导我们陷入知识陷阱,即认知污染。

它们能流畅解算高等数学难题,却对一些基础的事实视而不见。算法思维依赖统计模型,通过海量标注数据构建世界认知。所以,面对一些数据海洋中几乎不存在的异常值,算法便以其固有的路径依赖,强硬地将现实扭曲、裁剪,塞进预设的理解框架中,这是概率的胜利,却是真实的溃败。“算法性失明”一旦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危害会被无限放大。AI基于其固有范式生成文本、解释现象时,那些存在于其“训练数据”光谱之外的异常、矛盾或崭新视

当『算法性失明』介入知识生产

□白雪梅

角,极易被系统性地过滤、修正或忽略。人类若习惯于依赖此类输出,无异于戴上了一副自动过滤“不合理”现实的隐形眼镜。久而久之,我们认知世界的框架将在不知不觉中,被AI的统计偏好所同化,对真实存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失去敏感。知识不再是对客观现实的探索,而沦为对数据概率的复述;人类独特的质疑、直觉与对反常现象的捕捉能力,将在这温水煮青蛙般的“思维外包”中悄然退化。

让提问者感到恐惧的是,AI写作输出的错误知识,往往披着逻辑严密、表达流畅的华丽外衣。这份“优雅的错误”比粗糙的谬误更具迷惑性,它绕过批判性思维的防线,悄然塑造着我们的理解力。当这些被算法“规训”过的认知框架反过来成为人类思考的基础,思维的棱镜便蒙上了尘。思想的多样性被无形修剪,对世界的理解在AI定义的数据边界内日益扁平化。AI生产中的一些错误,暴露出目前深度学习的缺陷。也就是说,算法并非理解概念,而是通过统计模式匹配进行概率计算,其决策过程如同在黑暗中拼接拼图,似乎每个“神经元”只负责局部特征的识别,而整体认知的连贯性只是涌现现象。当然,我们需要的不是拒绝AI写作工具,而是重建一种清醒的认知免疫系统。让AI缪斯的书写能力服务于我们,而非定义我们,保持对原始材料的审视习惯,对AI的优雅输出始终怀有审慎的质疑精神。让人类独有的敏锐,成为驾驭AI缪斯的不灭内核。

长期与AI协作的作者,其问题解决策略呈现出明显的算法化倾向,倾向于将复杂问题拆解为可量化的模块,这也是人类与AI的共生预兆,AI正在重构人类的知识体系。这种思维驯化,可能会忽略直觉与顿悟的价值,或导致人类丧失突破认知边界的能力。当算法生成的学术论文通过同行评审,当AI撰写的历史书籍成为畅销书,人类将面临真假难辨的认知困境。我们对小冰的诗集,一开始可能抱有的是好奇,灵吟灵吟智能体的输出文本,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畅销书,或者影视改编脚本,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然而,令人类如履薄冰的是认知污染。在这个算法与思维共生的时代,我们既需要警惕技术带来的认知异化,也要拥抱它创造的可能性。人类学会在算法的镜像中审视自身,在认知的牢笼外寻找突破,才能真正实现思维的进化。这场人机对话的终极意义,或许在于重新定义智慧的本质,它不仅是个体的灵光闪现,更是不同认知范式碰撞出的永恒火焰。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理论探索

“卧游”:在不同媒介体验审美愉悦

□张 鑫

“卧游”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卧游”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卧游”关涉的媒介逐渐增多,“卧游”的方式也得以拓展。

从“卧游”到“可游可居”

“卧游”观有着悠久的演变历史。先秦道家典籍《文子》一书中已提出“卧游”的思想,《文子》第二篇《精诚》中有云:“故通于太和者,暗若醉醇,而甘卧以游其中。”这里的“卧游”,主要是指以身体极其放松的姿态来实现对“道”的追求。东汉《太平经》中阐明修炼时采用卧姿:“及其瞑目而卧……神在内也。及其定卧,精神去游。”这里的“卧游”主要指道家养生的具体实践方式。

这说明,早期的“卧游”主要指“达道”和养生,并无审美意涵。南朝画家宗炳用“卧游”来指代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卧游”观从此具有了美学意涵。据《宋书·隐逸传》记载,“(宗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炳性好山水,游览过诸多名山大川,在山水自然中流连忘返。晚年体衰多病,难以跋山涉水,便把山水画作悬于墙壁,日日观赏,体会卧游之趣。卧游之时,身体居于斗室,而心灵遨游于山水之间,逸趣无穷。

唐宋时,山水画蓬勃发展,画坛中涌现出众多山水大家,绘画理论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关于“卧游”的实践和言说也更丰富了。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

郭熙对“卧游”的阐释更加丰富,他的“林泉之心”是对宗炳“澄怀味象”的延续和拓展。只有具备虚静的心灵,才能拥有卧游山水的自得之趣。此外,在审美体验方面,宗炳认为欣赏山水的最终追求是“悟道”,山水是道的外在呈现,而郭熙更强调对山水本身的欣赏,追求无功利无目的纯粹审美愉悦。

“卧游”媒介和方式的拓展

“卧游”观不仅体现在书画领域,还逐渐影响到诗文创作领域。宋朝以后,以诗文为媒介的“卧游”活动在文人圈兴盛,文人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审美乐趣。

苏轼在扬州任太守时,曾钟情于友人程德儒所赠的两块石头,写出佳作《双石》。其中有诗句云:“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晶莹温润的白石仿佛经年积雪的太白山,褶皱连绵的绿石浑似峭拔的峨眉山。作者极尽想象,由眼前的方寸之石联想到自然中的万里山河,在小与大、实与虚的巧妙转化中,完成了一次逍遥的卧游。南宋诗人范成大也曾面对灵壁石产生无限遐思。他曾写有《小峨眉》,在序言中写道:“近得灵壁古石,绝似大峨正峰,名之曰小峨眉。东坡尝以名庐山,恐不若此石之逼真也。”作者以小小的灵壁石为媒介创作出想象清奇、意趣盎然的纪游诗,打破时空限制,完成精神的自由驰骋。

随着时代的发展,引发人们“卧游”的媒介也进一步拓展,从山水画到奇石,从花鸟画到日用器物,许多物件都可以触发文人的神思,引发其精神徜徉。明代画家沈周曾绘有一组《卧游图册》,其中不仅有山水风景,也有充满生活情趣的花鸟蔬果。可见,“卧游”的对象不必是风景,只要能引起无限遐思,就可以成为触发联想的媒介。

晚明之际商业繁荣,旅游成为市民阶层较为流行的休闲方式。此外,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极大推动了书籍的出版,旅游图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此时,“卧游”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文人阶层,普通市民也热衷于欣赏风景图册完成精神漫游。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钱塘夷白堂刊刻出版的《新镌海内奇观》用精美的画作呈现了一百多处风景名胜,欣赏此图册,宛若置身于山水名胜间,妙趣无穷。

结合科技,实现真正的“卧游”

古代的媒介总是有限,到了现当代,

随着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发展,“卧游”真正具备了真切实现的可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将郭熙的“可游可居”观变成电影中的现实,剧中人物只要拿起毛笔挥舞几下,就可进入《山河社稷图》中,实现在山水美景中游览的愿望。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该剧的“人人画中游”是全剧众多亮点之一,此一理念乃是对“卧游”观的创新转化。

传统“卧游”观的二维局限,在科技的助力下实现了突破。博物馆和美术馆利用高新科技,打造沉浸式的“卧游”体验。如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推出“运河上的舟楫”多媒体互动体验展,以实体体验结合数字多媒体虚拟体验的方式,展示大运河舟楫带来的南北文化融合与古今美好生活。观众可以步上运河上的所见所感。在浙江省博物馆的“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沉浸式数字展”的《探秘》主题展示中,空间整体通过数字技术切换为交互游览模式,观众可体验郊野、庭院、闺房三种互动场景。另外,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物馆等国家重点博物馆也持续推进数字展览,让游客有身在展馆而穿越古今、身游山河的参观体验。

总之,“卧游”观和“卧游”的媒介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卧游”观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陶冶人们的审美意趣,丰富人们的精神享受。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以“卧游”思想为灵感来源,持续推出文艺精品,带给受众持续隽永的审美愉悦,丰富了受众的精神世界,也实现了对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活力。特别是在网络时代、AI时代,“卧游”这种审美体验方式有了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的文艺在科技的加持下将开拓出无限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